

从养老负担到创业资本

——公共养老服务改革对个体创业的影响

龙腾 王海军

摘要 在人口老龄化与创新驱动发展并行的背景下,传统家庭养老负担日益成为制约社会活力释放的重要因素。公共养老服务改革作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社会政策,通过改变家庭资源配置和个体风险态度,激发个体创业行为,有效促使个体做出创业决策或者扩大其创业规模。对于城镇地区个体或者低老龄化家庭个体,公共养老服务改革的创业推动作用更加显著。公共养老服务改革对个人创业活动的激励作用,揭示了社会政策产生经济效应的内在逻辑。为了更好地发挥政策作用,养老服务与创业支持政策应当协同发力,以差异化策略平衡城乡差距与群体差距,强化家庭支持与金融引导。

关键词 公共养老服务;个体创业;老龄化;家庭支持;风险偏好

中图分类号 F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4-0115-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BJY09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5YYJ38)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4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5.6%,老年抚养比持续攀升至22.5%,家庭养老负担日益加重。传统养儿防老模式在少子化、空巢化、高龄化的多重冲击下难以为继:一方面,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单一子女需承担多位老人的照料压力;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大规模迁移加剧了代际分离,农村留守老人、城市独居老人群体不断扩大。家庭非正式照料的不可持续性不仅威胁老年人福祉,更通过挤占成年子女的时间与精力,抑制其劳动参与和职业发展。

在此背景下,公共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已成为国家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核心战略。构建多层次、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体系成为国家战略重点。2016年,民政部与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该政策分五批推进(2016-2020年),覆盖全国34个城市,核心目标是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提升服务的专业化与普惠性。这一政策不仅承载着改善老年人福祉的社会目标,更可能通过释放家庭劳动力、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等途径,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值得深入探究的是,此类以社会服务为初衷的政策干预,是否能超越其直接的社会目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产生推动作用,特别是促进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创业活动?这构成了一个连接社会政策与经济绩效的关键学术与实践命题。

综上所述,从“养老负担”到“创业资本”的潜在转化,蕴藏着重要的理论内涵与政策价值。在老龄化与创新驱动发展并行的背景下,厘清公共养老服务改革如何重塑创业决策的内在机制,不仅关乎政策效果的全面评估,更对激发经济活力、推动包容性增长具有现实紧迫性。

一、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多聚焦于养老政策的直接福利效应,如改善老年人健康水平、降低家庭医疗支出等^{[1][2][3]}。然而,对其间接经济效应,尤其是对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仍缺乏系统性探讨。研究表明,创业意愿受个人特质、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4][5][6][7]}。在个人特质方面,自我效能感和风险偏好是影响创业意愿的核心心理因素^{[8][9]},责任意识与经验开放性通过提升自我效能感间接增强创业倾向^[10]。在家庭背景方面,家庭经济支持与亲属创业经历为个体创业提供初始资源和社会资本,且亲属的创业经验通过示范效应降低个体风险感知^[11]。在社会环境方面,政策支持与金融可获得性是外部环境的关键变量^[12],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减少创业个体的预防性储蓄,能间接激励其承担创业风险。

目前,国内关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影响效应的研究较为稀缺,但仍可从以下几种分析视角拓展其对个体创业的间接行为影响,一是居家养老服务通过替代家庭非正式照料,释放潜在劳动者的时间资源,其机制在于正式照料服务替代了家庭非正式照料^[13],养老金提高使老年人的医疗消费比例上升,带动健康产业扩张^[14]。二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中非正规就业群体在政策支持下更易积累资源,创办企业^[15],如养老、教育等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强于基础设施类服务^{[16][17]},而人口规模扩张为创业提供了市场基础。因此,养老服务试点催生了护理服务、健康管理、智能设备等领域的创业机会^[18]。三是试点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等机制鼓励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19]。

总体来看,尽管已有研究从不同侧面触及养老服务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但尚未在一个统一框架内系统考察公共养老服务改革如何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个体创业决策。

本文基于中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政策,利用2010-2022年7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理论建模与渐进双重差分法(DID)的实证分析,系统揭示了公共养老服务对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及其内在机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构建动态跨期决策模型。本文将“家庭支持效应”与“风险偏好提升效应”纳入统一框架,系统阐释公共养老服务影响个体创业的双渠道理论机制,弥补了现有研究偏重单一视角的不足。第二,拓展研究视角。现有文献绝大多数将公共养老服务视为一种纯粹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其社会效益,例如改善老年人福祉、减轻家庭负担。本文则突破这一传统视角,率先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系统论证该项社会政策同样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即它能够通过重塑微观个体的行为决策,有效助推创业活动。这一发现为理解公共政策在老龄化社会中的多重角色提供新的理论视角。第三,为机制识别提供新的证据。本文利用微观数据直接检验政策对家庭照料时间、经济补助、预防性储蓄及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为“养老服务能够通过微观行为渠道激励创业”这一假说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跨期决策模型,分析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政策对个体创业的影响。

(一) 家庭支持效应:时间释放与创业

公共养老服务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家庭生产替代品”,直接进入家庭的效用最大化函数。它通过降低家庭内部生产的时间成本,改变了工资劳动、创业与家庭生产之间的时间配置边际替代率。首先,本文假设个体总时间 T 分配于三部分。工资劳动时间(L):获得固定工资收入 wL , w 为工资率。创业时间(E):创业收益为 $\pi(E)$,其满足边际收益递减($\pi'(E)>0$, $\pi''(E)<0$)。同时,将家庭照料时间设置为(C),用于表示家庭需照料老人所产生的时间成本。由此,本文构建一个效用函数:

$$U = \alpha \ln(Y) + \beta \ln(L_c) \quad (1)$$

其中:个体效用 U 取决于消费 Y 和闲暇 L_c (剩余时间), $Y = wL + \pi(E) - pC$, p 为照料成本(如购买护理服务的价格)。 $L_c = T - L - E - C$,即总时间(T)扣除劳动、创业和家庭照料时间。此时,若政府推出公共

养老服务政策,该政策能提供免费或补贴的照料服务,将照料时间减少 $\Delta C'$,那么新照料时间将降低为 $C' = C - \Delta C$ 。

根据以上效应函数,为求解个体的优化问题,假设个体在满足时间约束 $L+E+C \leq T$ 的前提下,选择 L 、 E 、 C 以最大化效用函数。基于此,建立如下拉格朗日函数:

$$L = \alpha \ln(wL + \pi(E) - pC) + \beta \ln(T - L - E - C) + \lambda(T - L - E - C) \quad (2)$$

针对式子(2),本文对相关的一阶条件求解,得到以下求导结果:

1.对工资劳动时间 L 求导:

$$\frac{\partial L}{\partial L} = \frac{\alpha w}{Y} - \frac{\beta}{L_e} - \lambda = 0 \quad (3)$$

式子(3)的含义表示为工资劳动的边际效用(收入增加带来的消费效用)等于闲暇的边际效用与时间约束的影子价格之和。

2.对创业时间 E 求导:

$$\frac{\partial L}{\partial E} = \frac{\alpha \pi'(E)}{Y} - \frac{\beta}{L_e} - \lambda = 0 \quad (4)$$

式子(4)的含义表示为创业的边际效用(创业收益增加带来的消费效用)等于闲暇的边际效用与时间约束的影子价格之和。

3.对家庭照料时间 C 求导:

$$\frac{\partial L}{\partial C} = -\frac{\alpha p}{Y} - \frac{\beta}{L_e} - \lambda = 0 \quad (5)$$

式子(5)的含义表示为家庭照料的边际成本(照料支出减少消费效用)等于闲暇的边际效用与时间约束的影子价格之和。

养老政策实施后,个体得到时间释放与创业激励,照料时间减少 ΔC ,闲暇时间变为 $L'_e = T - L - E - (C - \Delta C) = L_e + \Delta C$ 。此时,由于 $L'_e > L_e$,闲暇的边际效用 $\frac{\beta}{L'_e}$ 下降,工资劳动与创业的边际效用得到提升,上述一阶条件表达式(3)和(4)调整,即工资劳动与创业的边际效用提升为:

$$\frac{\alpha w}{Y} = \frac{\beta}{L'_e} + \lambda'; \quad \frac{\alpha \pi'(E)}{Y} = \frac{\beta}{L'_e} + \lambda' \quad (6)$$

根据式子(6)可知,工资劳动和创业的边际效用相对闲暇上升,推动个体减少闲暇,增加劳动或创业时间。因此,政策释放的照料时间 ΔC 部分转化为创业时间 E ,因创业的边际收益 $\pi'(E)$ 高于工资劳动边际收益 w (假设个体为潜在创业者)。综上,家庭支持效应可表达为 $\frac{\partial E}{\partial \Delta C} > 0$,即公共养老服务通过释放照料时间 ΔC ,使个体将更多时间投入创业 (E),且创业的边际收益高于工资劳动。

(二) 风险偏好提升效应:储蓄释放与风险承担

未来养老支出的不确定性构成了一种典型的背景风险,会加剧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抑制其将资产配置于高风险活动^[20]。公共养老服务通过降低这种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了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了家庭的整体风险厌恶。首先,本文假设家庭总资源 R 分配于消费 (C),当期效用 $\ln(C)$,预防性储蓄 (S):应对未来养老支出不确定性。创业投资 (K):风险性投资,成功概率 q ,成功时收益 $\pi(K)$,失败时收益为 0。根据以上变量定义构建跨期期望效用函数,效用函数为对数形式,隐含恒定相对风险厌恶 (CRRA=1),并设定效用函数表达式为:

$$U_t = \ln(C_t) + \delta \cdot E_t[q \ln(\pi(K_{t+1})) + (1 - q) \ln(S_{t+1})] \quad (7)$$

其中: δ 为时间贴现因子,反映个体对未来收益的折现偏好; E_t 表征第 t 期对 $t+1$ 期创业成功概率 q 和储蓄 S 的预期;资源约束调整为跨期形式: $C_t + S_t + K_t = R_t$,且 $R_{t+1} = f(S_t, K_t)$ 。以上式子说明个体在 t 期需权衡当期

消费 C_t 、预防性储蓄 S_t 与创业投资 K_t , 其决策直接影响 $t+1$ 期的资产积累 (R_{t+1}) 与创业收益 $\pi(K_{t+1})$ 。养老服务政策通过降低未来养老支出不确定性, 减少 S_t 并提升 δ 值, 即增强长期规划意愿, 进而优化跨期资源配置。

基于上述期望效用函数, 个体在资源约束 $C+S+K=R$ 下, 选择消费 C 、储蓄 S 与创业投资 K 以最大化其期望效用。据此, 对相关的一阶条件进行求解, 得到如下结果:

1. 对消费 C 求导:

$$\frac{\partial U}{\partial C} = \frac{1}{C} - \lambda = 0, C = \frac{1}{\lambda} \tag{8}$$

式子(8)的含义为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资源的边际价值。

2. 对储蓄 S 求导:

$$\frac{\partial U}{\partial S} = \beta(1-q)\frac{1}{S} - \lambda = 0, S = \frac{\beta(1-q)}{\lambda} \tag{9}$$

式子(9)的含义为储蓄的边际效用(预防未来风险的保险价值)等于资源边际价值。

3. 对创业投资 K 求导:

$$\frac{\partial U}{\partial K} = \beta \cdot q \frac{\pi'(K)}{\pi(K)} - \lambda = 0, \pi'(K) = \frac{\lambda \pi(K)}{\beta q} \tag{10}$$

式子(10)的含义为创业投资的边际期望收益等于资源边际价值。

公共养老服务政策实施后: 养老支出不确定性下降, 风险偏好提升, 预防性储蓄需求减少, 即 S 降低。由资源约束 $C_t+S_t+K_t=R_t$, 储蓄减少释放的资源可增加消费或创业投资:

$$\Delta C + \Delta K = -\Delta S \tag{11}$$

式子(11)说明在政策实施后, 养老支出不确定性下降, 预防性储蓄需求减少 ($\Delta S < 0$), 释放的资源可分配于: 增加消费 $\Delta C > 0$; 增加创业投资 $\Delta K > 0$ 。由一阶条件 $\pi'(K) = \frac{\lambda \pi(K)}{\beta q}$ 得出, 当创业投资 K 上升, 边际收益 $\pi'(K)$ 下降, 但政策通过降低 λ (资源边际价值下降) 抵消这一效应。因此, 政策降低预防性储蓄需求 (S), 增加创业投资 (K), 同时减少风险厌恶, 提高创业成功概率感知 q , 进一步激励创业。

综合以上两点理论推导分析可知,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政策针对有赡养需求的家庭进行扶助, 显著提升了个体创业概率。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公共养老服务政策通过“家庭支持”和“风险偏好提升”双重机制, 显著提升个体创业决策与创业规模。

三、研究设计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为验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对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 本文利用 2016-2020 年分五批推行的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 结合 2010-202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 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一) 模型设定

本文的基础模型设定如下:

$$Entrep_{ict} = \beta_0 + \beta_1 policy_c * post_t + \beta_2 X_{ict} + \beta_3 Z_{ct} + \mu_c + \mu_t + \varepsilon_{ict} \tag{12}$$

在上述方程式中, i 表示个体; c 表示城市; t 表示年份; $Entrep$ 表示为被解释变量的个体创业; $policy$ 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反映该城市是否实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虚拟变量, 用以区分实证分处理组和对照组, $post$ 为待检验的政策冲击变量; X 和 Z 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μ_c 和 μ_t 为个体固定及时间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干扰项, β 参数反映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实施对个体创业的影响。

(二) 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选取的个体数据均来源于2010-2022年我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同时合并第三产业增加值、城镇化水平和社会消费额占GDP比重等宏观经济数据,数据样本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年鉴。除分类变量外,其他经济指标均做了对数化标准处理,提升数据平稳性,最终得到的样本共有86294个观测值。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创业情况(<i>entrep</i>)	86294	0.473	0.499	0.000	1.000
创业决策(<i>job_class</i>)	86294	0.537	0.499	0.000	1.000
创业收入(<i>op_rev</i>)	40817	8.767	1.555	0.000	15.520
养老服务改革(<i>policy_c</i>)	86294	0.100	0.300	0.000	1.000
年龄(<i>Age</i>)	86294	3.860	0.315	2.303	4.575
年龄的平方(<i>Age²</i>)	86294	3.116	0.630	1.250	4.544
婚姻状况(<i>Mar</i>)	86294	0.843	0.364	0.000	1.000
户口性质(<i>Res</i>)	86294	0.735	0.441	0.000	1.000
是否购买医保(<i>Medsure_dum</i>)	86294	0.908	0.289	0.000	1.000
家庭老年抚养(<i>Elder_p</i>)	86294	0.164	0.378	0.000	3.000
家庭人口数(<i>Fml</i>)	86294	3.680	1.859	1.000	26.000
家庭总房产(<i>Est</i>)	86294	10.769	4.092	0.000	18.198
人均GDP(<i>GDP</i>)	86294	10.746	0.500	9.464	12.155
第三产业增加值(<i>TSVA</i>)	86294	9.342	0.841	6.510	11.170
城镇化水平(<i>UL</i>)	86294	0.560	0.229	0.113	1.152
产业结构指数(<i>ISI</i>)	86294	0.128	0.336	0.064	1.664
社会消费额占GDP比重(<i>FCE_GDP</i>)	86294	0.941	0.105	0.697	1.715
财政支出占GDP比重(<i>FE_GDP</i>)	86294	0.225	0.086	0.000	1.334

(三) 变量定义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本文将个体创业分为三个维度衡量,分别是创业情况、创业决策、创业收入。其中,创业情况(*entrep*)是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当前是否正在运营一个创业项目”的个体样本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创业决策(*job_class*)是指参考相关的研究^{[21][22]},根据受访者的工作类型/状态来判断个体是否为创业者,故本文的个体创业决策以CFPS数据中该个体当前最主要工作或最近结束的工作类型为衡量标准。本文将自家农业生产经营、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自雇视为正在个体创业,赋值为1,则受雇、非农散工以及农业打工赋值为0。创业收入(*op_rev*)是指参考相关的研究^[23],将创业收入以CFPS数据中个体从事个体私营(创业)的经营性收入为衡量标准。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以2016年民政部、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为基点构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虚拟变量(*policy_c*)。对于变量的实验组(*policy_c*),根据个人所在城市是否实施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进行确定。如果个人所在城市*c*在*t*年实施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则*policy_c*赋值为1,否则为0。对于政策的冲击变量(*post_t*),本文以《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的出台时间为基线,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政策试点时间及其之后的*post_t*赋值为1,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体与家庭特征变量和城市宏观经济特征变量。具体来看,首先, X_{it} 为一组个体与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年龄(*Age*)、年龄的平方(*Age²*)、婚姻状况(*Mar*,有配偶=1,无配偶=0)、户口性质(*Res*,农业户口=1,非农户口=0)、是否购买医保(*Medsure_dum*,购买医保=1,没

有购买医保=0)、家庭老年抚养比($Elder_p$)、家庭人口数(Fml)以及家庭总房产(Est),加入年龄平方项的原因是考虑到年龄对个体创业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其次, Z_{α} 为一组城市宏观经济特征变量,本文对可能影响试点政策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控制,如地区经济水平通过人均GDP(GDP)、第三产业增加值($TSVA$)、城镇化水平(UL)、产业结构指数(ISI)、社会消费额占GDP比重(FCE_GDP)以及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衡量(FE_GDP)。

四、实证分析

基于前文构建的理论模型与计量设定,本节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政策影响个体创业的效应进行检验。首先,通过基准回归分析政策对创业决策、创业类型及创业收入的整体影响;其次,从“家庭支持”与“风险偏好提升”进行渠道检验;最后,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可靠性。

(一) 基准回归

表2为全样本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对个体创业的基准实证分析结果。首先,列(1)和列(2)为交互项系数($policy*post$)对创业情况指标的影响,且实证过程中控制了样本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其中,列(1)在交互项的基础上验证创业情况的影响系数。考虑到区域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消费水平等城市宏观经济特征变量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创业的概率,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个体创业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实施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后,实验组个体创业决策相较于对照组个体明显增大。列(3)和列(4)为交互项系数($policy*post$)对工作类型指标的影响,列(5)和列(6)为交互项系数($policy*post$)对经营收入指标的影响,其中每列回归计算的处理方式与上一个指标相同。从后续结果可知,交互项系数对工作类型指标和创业收入指标的影响均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三项基准回归结果意味着,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政策实施后,个体创业概率有了显著的提升,该结果为本文观点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i>entrep</i>	<i>entrep</i>	<i>Job class</i>	<i>Job class</i>	<i>op_rev</i>	<i>op_rev</i>
$policy*post$	0.028*** (5.16)	0.019*** (2.97)	0.013* (1.93)	0.017** (2.21)	0.092** (2.17)	0.095* (1.88)
常数项	0.818*** (22.83)	0.837*** (3.57)	1.015*** (5.98)	1.264*** (4.37)	9.827*** (6.38)	10.439*** (5.30)
观测值	86294	86294	40817	86294	86294	40817
R ²	0.031	0.038	0.018	0.011	0.012	0.009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表同此)。

(二) 机制效应检验

本文进一步从“家庭支持”效应、“风险偏好提升”效应两方面讨论个体创业变化的影响渠道,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影响个体创业的方式,更加具体地讨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所影响的个体创业效应。

1. 家庭支持效应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影响个体创业的核心机制之一在于公共养老服务的正式照料替代了家庭的非正式照料,释放个体潜在劳动力的时间与精力。本研究认识到家庭支

持是一个多维概念。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主要从经济资助和代际照料两个维度来衡量“家庭支持”效应。第一,个体照料家庭。使用家人照料时长(*Hour*)和家人照料行为频率(*Times*)指标来衡量。若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实施以后,公共养老服务的正式照料得到普及,则照料家人的时间减少、频率降低,尤其是家庭照料的主要角色中年人群体,极大减轻了个人照料家庭的时间压力和经济负担。第二,家庭支持个体创业。使用每周(外)祖父母帮助照料孙辈的时间(*Soc*)和父母经济资助(*Income*)该指标来衡量。父母的经济支持会影响创业的资金状况和决策,对创业的投入、资源分配和持续性产生作用,这促进了个体创业^[24]。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至列(2)是个体照料家庭的结果,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对家人照料时长、照料行为频率的影响分别为-0.969、-0.026,且影响系数均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实施后,有赡养义务的子女个体照顾家人的时长减少和照料家人的频率降低,说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实施减少了子女对老人的赡养时间与减缓老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释放子女个体的时间和减少子女对家庭的补贴,有利于个体创业。列(3)和列(4)是家庭支持个体创业的结果,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对父母帮助照料孙辈的时间和父母经济资助指标的总影响系数为正,且系数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下家庭给予子女个体创业的代际照顾和经济支持的程度加大。

表3 家庭支持效应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个体照料家庭		家庭支持个体创业	
	<i>Hour</i>	<i>Times</i>	<i>Soc</i>	<i>Income</i>
<i>policy*post</i>	-0.969** (-2.53)	-0.026** (-2.31)	0.101** (2.19)	0.074*** (2.72)
常数项	6.637 (0.77)	-0.754* (-1.85)	-6.326*** (-4.47)	1.020 (1.01)
观测值	86294	86294	86294	86294
R ²	0.25	0.212	0.116	0.13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2. 风险偏好提升效应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下老人得到有保障的正式照料,降低了家庭对未来养老支出不确定性,则更高的创业收益进一步提高个体承担创业风险的意愿。本文从储蓄与流动性和风险承担与杠杆两个维度选取指标。第一,储蓄与流动性,使用现金及其存款(*Sav*)、家庭总金融资产(*Finance asset*)两个指标衡量。第二,风险承担与杠杆,使用债务与收入之比与金融产品总价两个指标衡量。债务与收入之比(*Dti*)、金融产品总价(*Fin*)两个指标衡量,其中,金融产品总价为家庭所有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或合约金额。

表4的列(1)至列(2)报告了储蓄与流动性的结果,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对现金及其存款和家庭总金融资产指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42和0.397,且系数均至少在1%的水平上保持正向显著,这与传统预防性储蓄理论有所不同,传统理论认为养老保障的完善会降低家庭对未来风险的担忧,减少高流动性安全资产即预防性储蓄。家庭预防性储蓄的积累可能并非单纯出于预防性动机,而是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下增强个体发展的信心,促使家庭更主动地储蓄高流动性的现金及存款和增加其他投资性资产以支持创业,而非直接减少储蓄。列(3)至列(4)是风险承担与杠杆的结果,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对债务收入比与金融产品总价指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5.644和0.257,且系数均至少在10%的水平上保持正向显著,这说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可通过降低家庭未来不确定性,减少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鼓励其承担更高风险的经济行为。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通过降低风险厌恶和增强风险应对能力提升了家庭的风险偏好,增加家庭总资产包括高流动性资金和投资性资产,更愿意提高债务收入比及扩大创业投资,且对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容忍度提高也提升了对创业风险的容忍度。

表4 风险偏好效应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储蓄与流动性		风险承担与杠杆	
	<i>Sav</i>	<i>Finance_asset</i>	<i>Dti</i>	<i>Fin</i>
<i>policy*post</i>	0.342*** (3.67)	0.397*** (3.78)	5.644* (1.67)	0.257*** (3.64)
常数项	7.798** (2.28)	114.686*** (29.85)	281.656** (2.25)	-4.445** (-2.28)
观测值	86294	86294	86294	86294
R ²	0.014	0.131	0.011	0.0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与机制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排除潜在的混淆因素与模型设定偏误,本文从动态政策效应、安慰剂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以及调整样本量等多个角度展开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如下。

1. 动态检验

本文将2016年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政策的实施设定为事件发生年份,将政策发生的前一年设定为基期,并且对样本发生年份前后3期的政策效应进行检验。本文以创业情况指标Entrep为例,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在图1呈现,可以发现,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政策实施以后,可见创业指标的系数均呈现持续扩大的态势,结果说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政策对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持续存在于政策实施当年以及随后的几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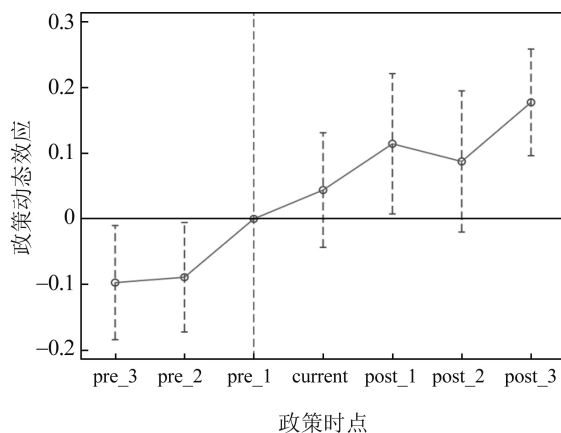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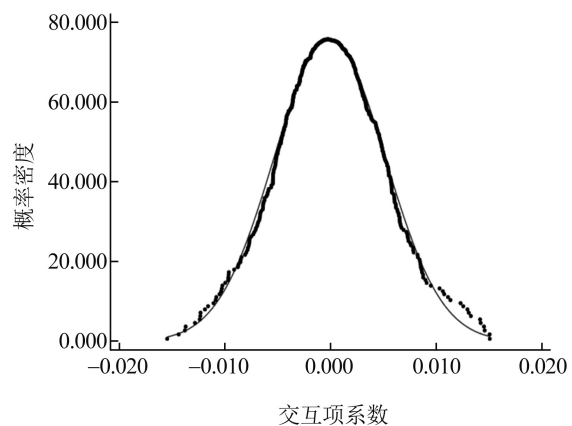


图2 安慰剂检验结果

2. 安慰剂检验

本文构建随机处理组和随机政策处理效应,然后重复这一过程 500 次。结果如图 2 所示,交互项系数集中在 0 轴附近,表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政策确能够对个体创业行为起到明显的激励作用,并且所得的影响效应不是源于其他未控制的偶然因素。

3.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估算方法

为了验证本文选取被解释变量影响系数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通过使用经营资产(*op_as*)作为稳健性检验替代指标。创业中经营资产中的资金规模是决定企业能否存活的关键门槛,企业规模大小、企业年龄和资本密集度等企业特征会影响企业存活率^[25](P50-62),资本支持的企业存活率则高达 80%,企业家资产净值的动态变化与企业家的存活率相关^[26](P66-77)。故本部分将经营资产(*op_as*)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重新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5 第(1)列所示,交互项指标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更换企业经营状况计算方式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依旧明显促进了个体创业,与前文基准回归结论保持一致。

4. 调整样本量

本文对样本量作以下调整:一是删除直辖市样本。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直辖市是以区为单位进行申报和开展改革试点,但本文基准回归以市为样本单位,故将整个直辖市视为试点城市则有可能低估试点的效果,医养结合试点改善了老年人健康状况^[27],促进老人健康收益提升、医疗消费减少,促进子女就业收入增加^[28]。表 5 的列(2)至列(4)列删除了直辖市,结果显示试点对个体创业正向影响稳健。二是列(5)至列(7)仅考察 25-50 岁样本。考虑到年龄对个体创业的客观因素和主观意愿,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的风险偏好与创新能力可能受到其年龄的限制进而抑制了创业意愿^[29],因此,本文仅考察试点对 25-50 岁个体创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关于个体创业的结果依旧稳健。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经营资产	剔除直辖市			保留 25-50 岁样本		
	<i>op_as</i>	<i>entrep</i>	<i>Job class</i>	<i>op_rev</i>	<i>entrep</i>	<i>Job class</i>	<i>op_rev</i>
<i>policy*post</i>	1.018*** (2.8)	0.015** (2.1)	0.015* (1.72)	0.101* (1.9)	0.012 (1.5)	0.017* (1.81)	0.183*** (2.84)
常数项	135.378*** (9.49)	0.956*** (3.59)	1.393*** (4.36)	9.208*** (4.48)	0.590** (2.02)	0.800** (2.25)	11.512*** (4.43)
观测值	36386	59210	43284	26068	44007	33918	18161
R ²	0.389	0.038	0.011	0.008	0.044	0.016	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五、异质性分析

到目前为止,本文证实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是否会促进个体创业以及通过何种渠道对个体创业产生影响,但与此同时,该政策对个体创业的影响在不同城乡地区与不同家庭老龄化程度中是否存在差异,仍有待验证。有鉴于此,本文接下来讨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对个体创业影响的异质性变化。

(一) 城乡地区差异

由于城乡间在养老服务资源、家庭养老依赖度及创业环境上存在显著差异,故本文进一步进行分组回归分析,以考察政策效应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列(1)至列(3)为城镇的回归结果,列(4)至列(6)为农村的回归结果。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对城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而对农村的指标均不显著,说明城镇受政策影响效应更强,农村受政策影响甚微或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根据分析结果可知,城镇老年人收入较高且需求分层明确,试点政策通过补贴、场地支持和技术赋能精准匹配了专业化服务供给,加之医疗资源密集、数字化基建完善,创业者可快速形成规模化运营;反观农村,尽管老龄化程度更深,但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固化、支付能力薄弱与资源结构性匮乏形成多重掣肘,最终呈现政策效果不显著的城乡分化格局。

表6 城乡地区差异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i>entrep</i>	<i>Job class</i>	<i>op_rev</i>	<i>entrep</i>	<i>Job class</i>	<i>op_rev</i>
	城镇			农村		
<i>treat*post</i>	0.024*** (3.11)	0.021** (2.11)	0.223** (2.52)	-0.009 (-0.78)	0.006 (0.43)	-0.016 (-0.24)
常数项	0.316 (1.03)	1.639*** (3.94)	9.288** (2.41)	1.546*** (3.53)	1.566*** (3.01)	12.100*** (4.73)
观测值	31,585	22,086	8,406	30,857	22,719	18,166
R ²	0.020	0.007	0.035	0.035	0.012	0.0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二) 家庭老龄化程度差异

根据样本家庭老年抚养比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度老龄化家庭与低度老龄化家庭。老年抚养比高于样本中位数的家庭定义为高度老龄化家庭,反之为低度老龄化家庭。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家庭老龄化程度差异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i>entrep</i>	<i>Job class</i>	<i>op_rev</i>	<i>entrep</i>	<i>Job class</i>	<i>op_rev</i>
	高度老龄化家庭			低度老龄化家庭		
<i>treat*post</i>	0.017 (1.06)	0.010 (0.57)	0.112 (1.59)	0.016** (2.19)	0.024*** (2.70)	0.116*** (2.59)
常数项	-0.613 (-0.96)	1.333* (1.75)	4.378*** (2.91)	0.838*** (3.14)	1.216*** (3.65)	3.461*** (3.67)
观测值	15302	10568	17294	48433	35357	19476
R ²	0.026	0.013	0.029	0.038	0.013	0.05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其中列(1)至列(3)为高老龄化家庭的回归结果,列(4)至列(6)为低老龄化家庭的回归结果。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对低老龄化家庭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而对高老龄化家庭的指标均不显著,说明低老龄化家庭受政策影响效应更强,高老龄化家庭受政策影响甚微或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结果说明,在

高老龄化家庭中空巢老人或独居老人的比例可能较高,老人对养老服务的接受度和使用率较低^[30],且高老龄化家庭中的照料需求复杂多样,试点提供的服务可能无法完全满足这些家庭的需求,难以显著改善其家庭照料负担。在老龄化家庭中,家庭成员的照料机会成本较高,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照料者,而改革试点通过提供专业照料服务使这些家庭成员能够更自由地参与社会活动,进而提高创业可能性。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6-2022年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政策,构建渐进DID模型系统考察了公共养老服务对个体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通过“家庭支持”与“风险偏好提升”双重机制显著促进了个体创业,但效果存在显著异质性:城镇、低老龄化家庭受益明显,而农村、高老龄化家庭群体受资源与需求错配制约。结果表明,养老服务改革不仅是应对老龄化的社会政策工具,更可有效推动银发经济活力,为包容性增长提供新路径。基于这些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养老服务与创业支持政策协同发力。本文基准回归表明,公共养老服务能显著促进个体创业。建议将养老服务改革纳入区域创业激励政策体系,通过税收优惠、创业孵化、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社会企业开发智慧养老、健康管理等新业态,形成个体创业的良性循环。

第二,采取差异化策略以弥合群体与城乡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效果在城乡、教育、家庭结构等维度差异显著。建议在农村地区推广“家庭养老床位”“互助养老”等轻资产模式,配套支付补贴与基础设施支持;针对高老龄化家庭,提供专业化、多层次服务,减轻家庭照料负担。

第三,强化家庭支持与金融引导政策。机制检验表明,政策通过释放家庭照料负担与提升风险偏好促进创业。建议应扩大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范围,优先覆盖有创业意愿的家庭照料者;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创业金融产品,支持家庭将储蓄转化为创业投资。

参考文献

- [1] N. Fritz, K. Jon. Regulating the Retirement Age—Lessons from Nordic Pension Policy Approaches. *Regulation & Governance*, 2022, 17, (3).
- [2] Z. Peng, Z. Anqi, M. Xinxin. Public Pension Policy, Substitution Income, and Poverty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3, (80).
- [3] 龙腾,王海军.人口老龄化对主权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 *世界经济研究*, 2023, (2).
- [4] Y. Linhui, T. Xuepeng, H. Xianhai. Doe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mote Entrepreneurship?—Evidence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3, (6).
- [5] 郑军,伍安琪.普惠保险、家庭创业与贫富差距.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3, (1).
- [6] 刘志阳,刘姿含.家庭创业资本能促进农村女性创业吗?——宗族网络和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3, (2).
- [7] 赵家未,李玉莹.退役军人创业行为研究:动因及效果. *科研管理*, 2024, (10).
- [8] M. E. Céspedes, I. R. Alonso, C. M. Mir. Individu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Financial Literacy.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23, 20(3).
- [9] 龙腾,王海军,林芷滢.农村征地补偿是否会助推家庭债务风险?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
- [10] Z. Peng, G. Lu, H. Ka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Survey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Xi'An China. *Creative Education*, 2012, (3).
- [11] 曹壹帆,肖亚成.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考察. *中国农村观察*, 2024, (2).
- [12] 龙腾,王海军,孟万山.主动选择与被动反应:主权债务对财政政策周期性的影响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 2025, (10).
- [13] 李琴,肖月,刘宏等.公共养老服务与劳动供给——来自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试点的证据. *经济研究*, 2024, (12).
- [14] 焦娜.社会养老模式下的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基于模糊断点回归的分析. *人口与经济*, 2016, (4).
- [15] 韩峰,李玉双.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经济研究*, 2019, (11).

- [16] 顾永红,刘宇.代际补偿与有效供给:社区代际互助养老长效运行机制探索.社会保障研究,2023,(5).
- [17] 王海军,葛晨.数字素养促进了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吗?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4,(3).
- [18] 孙鹃娟,田佳音,陈雨欣.替代还是补充?居家养老服务对中国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影响效应.人口研究,2023,(6).
- [19] 钟慧澜.理论融合视阈下的城市社区老年助餐多元供给研究——以上海个案为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 [20] 王海军,汪能,龙腾.收入多样性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的影响研究.上海金融,2023,(7).
- [21] 谷晶双.儿童照料与女性创业——基于CFP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24,(6).
- [22] 胡熙.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与家庭创业行为——来自“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的证据.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4,(6).
- [23] 何志扬,吴琼.“流动与赋能”: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村青年女性创业及其绩效的路径——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南方人口,2024,(4).
- [24] F. Tehreem, A. B. Raza, M. I. Kashif et al. Individual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raining: An Experimental Insight into Small Business Owner Career Succes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024, 31(5).
- [25] 余淼杰,王霄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企业生产率.学术月刊,2021,(3).
- [26] 金祥义,张文菲.金融加速器、预期消息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选择.当代财经,2022,(3).
- [27] 高鹏,杨翠迎,周彩.医养结合与老年人健康养老.财经研究,2022,(4).
- [28] 张磊,邓紫琪.老有所医与老有所依:医养结合政策的代际经济支持效应.中国人口科学,2025,(1).
- [29] 高雅,邬红梅.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农民非农创业影响因素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
- [30] 卢文秀,吴方卫.养老服务与农村家庭养老——来自中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证据.财经研究,2024,(3).

From Elderly Care Burden to Entrepreneurial Capital

The Impact of Public Elderly Care Service Reform on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hip

Long Te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Wang Haijun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current population aging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the mounting burden of traditional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tands as a major barrier to unleashing social vitality. The reform of public elderly care services, as a key social policy addressing aging challenges, stimulates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hip by reshaping family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ltering personal risk preferences, effectively encouraging individuals to make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and expand existing ventures. The reform finds a more pronounced driving effect on entrepreneurship among urban residents and households with a low aging ratio. The incentive impact of the reform on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hip thus reveals the underlying logic behind the economic effect of social policies. To fully leverage policy dividends,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entrepreneurship support measures should work in tandem, with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bridging urban-rural and intergroup disparities and efforts stepping up to strengthen family support and financial guidance.

Key words public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hip; population aging; family support; risk preferences

■ 作者简介 龙腾,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广东广州510320;

王海军,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北京381341。

■ 责任编辑 何坤翁